

(上接第1版)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为浙江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新机会。”浙江省发改委城镇处相关负责人说。在嘉湖片区建设过程中，我省将从钱、地、人等角度切入，实现城乡“双赢”，用好城乡资源、扩大城乡资源，早日形成可推广借鉴的发展经验，推动全省高质量协调发展。

一个试验区，真的蕴藏了如此巨大的能量？从浙江松阳的一个小山村能够看出端倪。大山深处的松阳四都乡一度因为山高路远成为“空心村”。近年来，这里的乡村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吸引外来资本，建民宿、建书店、建文创基地。人气旺了，曾经凋敝冷清的乡村再次焕发出活力。最近五年里，四都乡累计吸引外来工商资本投资超过4亿元。

可见，如今的中国乡村正在成为吸引资本、人才流动的新热土。而这背后的重要原因，便是新业态的发展，架起推动城乡循环的重要桥梁，推动了内需市场的扩大，畅通了国内大循环。

而在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嘉湖片区的方案中，为提升乡村产业能级，推动新业态发展，嘉湖将“城乡共同体”作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业态布局的内在逻辑，谋划了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嘉兴秀水新区、南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等6大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为培育新业态注入动能。

而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在方案中，第一条试验措施提到：聚焦城市落户“进得来”、农村权益“带得走”，健全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将进一步打破城乡人口之间的界限，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中扮演重要角色。”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说。

但在卓勇良看来，探索还可更加大胆。“城乡融合，不仅是要想进城的农民可以进城，还要让人乡的城里人进得去乡。”这一观点正是源于去年底卓勇良到另一块“试验田”花园村的调研，彼时，花园村刚刚成为我省首个“村域小城市”试点。

“这就要求浙江在城乡融合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乡村能级，让村民实现就地市民化。”卓勇良说，就地市民化一旦完成，便能在开拓农村市场的同时，提升村民的消费水平，让经济在乡村内部循环起来，从而进一步强化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比较优势，推动全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第三极之争的内生动力

关于花园村这块“试验田”的意义，涌金君曾做过详细分析：

《浙江在全国首创“村级市”，未来农村会“消失”吗？》

《涌金策|浙江首个“村级市”为什么是花园村？原因是“三个千”》

这次涌金君多用些笔墨讲讲国家成型融合发展试验区。

如果说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片“试验田”的第一关键词，那另一个关键词便指向嘉湖一体化。

而这个指向，将牵扯到一个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浙江经济第三极之争。

换言之，“新型城镇化”将成为引子，引发一场激发整个浙江发展内生动力的区域竞争。这也是涌金君将新型城镇化看做浙江发展新机遇的重要原因。

2019年，在浙江大湾区规划建设过程中，嘉湖一体化被提出，2020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启动实施杭绍甬、甬舟、嘉湖、衢丽花园城市群一体化行动，加快推进城市群同城化。

经过两年的探索，嘉湖一体化已取得一些成绩，两地共推数字经济、旅游会展协同发展，共谋嘉湖城际、水乡旅游线，共建“练市—乌镇”一体化合作先行区，一体化发展迈入纵深推进新阶段。

但放眼全省，同一时期被点到杭绍甬、甬舟、衢丽一体化相比，嘉湖两市的联动逊色不少——这两年，杭绍台高速先行段通车，杭绍城际铁路试跑，杭绍台铁路铺轨，绍兴拉近了与杭州的时空距离；甬舟铁路开工，甬舟一体化迈入新阶段；衢州丽水同为大花园核心区，以绿色为基地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声有色……

有关专家认为，与其他地区相比，嘉湖一体化进展偏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嘉湖之中没有能够带动周边发展的高能级城市，其二，两者之间存在能级上的差距，发展中找到契合点难度更大。

而在涌金君看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或许能够成为嘉湖一体化的新切入点，为两地发展打开新局面。

作为我省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无论是发轫于16年前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还是当下如火如荼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嘉湖两地早已为城乡融合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经验。

过去，人们总习惯将这些经验独立看待，但如果把嘉湖作为一个整体，这便是两地能够超脱城市能级，促成一体化发展的最好方向。

在采访中涌金君发现，面对全新的“试验田”，嘉湖两地做了充分准备，这背后也藏着嘉湖两地的发展目标。

嘉兴市发改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嘉兴正着力打造浙江经济第三极，但在从2020年11市的GDP看来，其不仅与温州、绍兴存在不小差距，紧随其后的台州也仅是一步之遥。

“这次试验区，将是十四五时期，嘉兴乘势而上的关键。”该负责人说。从嘉兴的十四五规划中也能看到此般雄心，嘉兴的“十四五”规划提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9000亿元以上、力争1万亿元。这一目标直逼温州，超过绍兴。

而湖州，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当之无愧的“黑马”，近两年来，发展动作频频，去年沪苏湖高铁的开工与商合杭高铁的通车为其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由此看来，试验区的设立，不仅为嘉湖一体化打开新局面，更让温台与嘉湖的浙江发展第三极之争有了新的看点。

日前，温州市政府与台州市政府签署《温台民营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围绕温州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与台州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建设，共建温台民营经济协同发展高地，打造长三角金南翼重要发展极。这一举动，颇有些“接招”的意味。

“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本就是常态，这种良性竞争能够推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秦诗立说。无论是以城乡融合为切入点的嘉湖，还是共擎民营经济大旗的温台，这也都呼应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

当全省各地都动起来，浙江发展的新机遇也便不言而喻了。

(据《浙江日报》“涌金君”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重温历史，走向复兴。本报特开设“风雨兼程 百年党史”栏目，刊发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重大党史事件以及重要党史人物，以飨读者。

新民学会对建党的贡献

1918年4月，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倡导下，新民学会在长沙湘江之畔蔡和森寓所成立。毛泽东、蔡和森领导的新民学会历经国内外探索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人才基础和斗争实践基础，作出了贡献。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

作为一个学术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初创时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各种思想问题和国内外形势，探讨中国的去向问题。已到北京大学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传来留法勤工俭学招生的消息，开启了新民学会会员赴京筹款勤工俭学、接触进步新思想、踏上人生新路的社会实践。毛泽东主张人才应散于世界各地去考察，不应堆积于一处，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了解当时世界最进步思想学说为中国所用。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的决策，由蔡和森、萧子升带领19名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毛泽东等则坚持留在国内，研究和解决湖南和中国问题，“从事实际进行改造”。

蔡和森在法勤工俭学期间，用执着精神阅读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

著作，并及时向国内毛泽东、陈独秀写信，系统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9月16日的来信中重申“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明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介绍了列宁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组织机构和建党步骤。他是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全称和建党理论的人。

毛泽东等人在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经验，实现人生观、世界观转变，迅速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一封信中指出：“固然要有一批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信中则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依据”，支持蔡和森提出的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的主张，认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0年7月，赴法留学骨干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法国蒙达尼公学召开社员大

会，一致通过把毛泽东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新的方针，并就如何实现进行了讨论，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革命、组织共产党。1921年1月初，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宗旨和目的，从而实现了一个学术团体向革命团体的转变，这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奠定了重要基础。

下决心“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从1915年9月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嘤鸣求友开始，经过广泛交际，“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凝聚了一批心忧天下、目光远大、意志坚定、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毛泽东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学会标新立异，除旧布新，充溢着求知欲和开放气息，会员从发起时的十几人发展到70多人，凝聚和影响了一大批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分子，特别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培养了一大批坚定革命信仰的共产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图为湖南长沙橘子洲头。

中国共产党党史

1926年

1月1日至1月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

2月21日至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会议决定建立中央军委，随后建立军事部。

3月18日，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万余人的反帝示威大会。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死47人，伤199人，酿成“三一八”惨案。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此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10月1日，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会议。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

1927年

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三十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4月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于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

4月25日，武汉举行了三十万人的反蒋大会。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

5月21日，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

7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28年

1月，江西弋阳、横峰等地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并逐步建立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月，朱德、陈毅等举行宜章和郴州（今郴县）等县的武装起义，扩大了革命武装。周逸群、贺龙到洪湖、湘鄂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3月至6月，闽西龙岩的后田，上杭县和永定县等地先后发生武装起义。

5月20日至5月22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了人才基础。学会的78名会员，其中有37名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多人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卓越的领导人和精英。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10名新民学会会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多名党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入共产党人数最多的进步团体，在党还很弱小的时候投身革命，成为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道路的中坚力量。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新民学会成立后，先后组织湘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发动长沙五四反帝游行示威，成功驱逐军阀张敬尧以及湖南省自治运动。在以上这些斗争和实践中，会员不断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长为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反帝反封建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外积极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夏明翰、蒋先云在衡阳，邓中夏、蔡和森等在北京，黄爱等在天津，田汉在日本参与到这场为争取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中。7月14日，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大声呼唤：“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革命刊物之一。《湘江评论》高举反帝爱国旗帜，倡导冲破封建思想束缚、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主张“民众的大联合”，指出人民群众运动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国家坏到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种民众大联合的策略成为后来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即统一战线。许多青年如任弼时、萧劲光、郭亮、夏明翰就是受《湘江评论》影响开始了革命的觉悟、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的。

随着广大知识青年和各阶级人民开始觉醒，湖南掀起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提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起草罢课宣言，长沙几十所学校13000多名学生罢课，张敬尧下令秘捕毛泽东未成，反而激起毛泽东组织庞大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武汉、上海、广州请愿。毛泽东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等指导启发下，利用直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逼走了张敬尧，驱张运动胜利了。

随着许多会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新民学会停止活动。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随即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新民学会解散了，但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的基础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得到加强和发扬，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也被传承下来。

人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142人，其中正式代表（即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党员13万余人。大会通过《政治决议案》等文件。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盲动错误。

7月22日，原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举行平江起义。

10月5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体同志书》，指出这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我们目前制定一切策略的准绳，要求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

(未完待续)

